

“南诏史探”第三辑之二

南诏野史选最与校按

廖德广 编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序

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 薛祖军

记得几年前的一次师生聚会交谈中，廖德广老师跟我们几个同学说，他正在做一个有关南诏大理国及元代大理总管历史史料方面的辑录整理汇编工作，希望为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民族历史研究尽点微薄之力，为研究南诏大理国的学者提供一套方便查阅和引证的文献资料。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希望廖老师能尽快完成此项工作，造福桑梓，服务好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研究。廖老师还说等书稿成刊时，希望我给此书写个序言。我当时就很惶恐，觉得自己虽然喜好云南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但学识浅薄，不足以为老师的宏篇大作作序。然而，廖老师却说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而且对云南历史有兴趣，况且我们师生有缘，希望我不要推辞。师命不可违，只好勉为其难，在认真拜读老师的书稿后，写出自己心里的感言。

廖德广老师此次的书稿是“南诏史探”第三辑，该辑共分4本：《南诏史料辑要与校按》《南诏野史选最与校按》《南诏史探选题与专论》《南诏野史新编与校按》。丛书以递进的层次对南诏国、大理国及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及云南古代历史的相关文献、史料做了进一步的考据和校正。这是廖德广老师将自己潜心研究云南古代的南诏国、大理国和元代大理总管等段历史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文史资料进行了辑录、考证与汇编，也是茫茫文献史料瀚海里的精英撷取。该书的出版发行，将是研究南诏国、大理国及元代大理段氏总管的所有史学工作者和兴趣爱好者的幸事，亦是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大好事，将为喜欢南诏大理国历史和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的学者、读者打开一扇阅读该段历史可信史料的窗口。

在《南诏史料辑要与校按》书稿中，作者开宗明义讲述了编撰“南诏史料辑要”的目的：“就是想把‘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的原始史料，及散存于唐、宋、元、明等正史，及其他重要史著中编撰的基础史料，尽可能‘一网打尽’，以便于倾心致情于阅读、研究‘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等云南古代历史的人们，只须此卷在手，就不用花费时间、金钱与精力去四处搜寻。”作者阐言：“之所以进行力所能及的‘校按’，是因为：不论《南诏德化碑》《石城约盟碑》《段世（明）

与傅友德书》等几件‘南诏国’‘大理国’‘段氏总管’的，以及《蛮书》《云南买马记》《大理行记》《总兵官征南将军檄示大理守土段信苴世》等若干唐、宋、元、明的原始史料，还是新、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史，及《资治通鉴》等中的基础史料，都有一些前辈、同仁没有发现的错误，以及一些当时就没有写明白，或古今文字差异、社会背景不同、相关知识缺乏等而读不明白，于是不得不有意或无意予以回避的问题。”作者以为：“不论原始史料，还是正史中的基础史料中，都有一些‘错误’及‘不清’的问题，而历史地名、古代官职、历史人物等，今人往往不知，如无专业词典，很难弄清，故有必要作些校按。”“对史料中的讹误进行考订而作的‘校’，及主要针对古官职、古地名、古史迹、古礼制等，如非历史专业及有相关工具书的阅者，是不易弄清的，为方便理解有关内容计所作的解释性的‘按’，均写于有关文、词、句、段后的括号内。不论‘校’和‘按’，如有必要再作些阐释的，在文后撰‘校按说明’。至于史料中的错别字，不常见的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等，只以字后括号作注，不予说明。因如有疑义而欲考证，只须查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即可办到。”正是基于以上的考量，所以廖德广老师用“背景简介”“史料原文”“辑要简言”“校按说明”“注”等性质的阐述内容一一揭示给读者，用心可鉴。由此打开了一扇洞悉史料来源、史料背景和史实究竟的窗口，让人一目了然，茅塞顿开，省去诸多困惑与不解，对史料的正确理解与运用有莫大帮助与启迪，可谓详集慎考、辨误释疑，这是该书最大的亮点所在。

在《南诏野史选最与校按》书稿中，作者阐明：“‘南诏野史选最’，即选择《南诏野史》书系中，以及虽以其他称名，但性质同为研究“‘南诏’（即‘南王’，包含‘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为主体的“云南地方故国君王”）历史的史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六份文献，以饷倾心致情于“南诏”历史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所选定的6份“选最”文献是：1. 宋朝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是于“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集”的最早系统追溯当时‘滇’（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地域上‘南诏’（南王）历史的文献。2. 元朝赵顺撰《夔古通纪浅述》，是《南诏野史》书系之前，最原始而重要的用‘白文’写成的《夔古通记》（又称《夔古通玄峰年运志》）的演绎之书的幸存本。3. 明朝杨慎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撰《滇载记》，是历来被史家、学者参考辑按最多的一份重要文献，因依‘白文’本《夔古通记》再创作而成。4.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云南昆明人倪辂撰《南诏蒙段野史》，是最先以‘南诏’及‘野史’词汇命名，从而开《南诏野史》抄写、整理、校正、增订、印刷，而形成众多《南诏野史》版本书系先河的首创之作。5. 明朝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

云南马龙人阮元声著，清朝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浪穹（今洱源）人王崧校正、编纂的《南诏野史》，是《南诏野史》书系中“最足征信”（云南经科状元袁嘉谷评语）的版本。6. 清朝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胡蔚《增订南诏野史》，是《南诏野史》书系中“流传最广”（云南经科状元袁嘉谷评语）的版本。此为《南诏野史》书系中的“三最”，是云南“南诏”（南王），即南诏历代、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及明、清时期的短暂涉王历史研究的三个代表性成果。”在所辑书稿里，廖老师仍然用“德广校”“德广校补”“德广按”以及校按说明性阐述将所辑的6份珍贵史料一一展示给读者，并花较大精力和心血将自己的考释和研究心得罗列文中，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鉴伪存真，由此打开了一扇洞悉史料背景和真伪的窗口，对云南珍贵史料的正确运用有莫大的帮助。

在《南诏史探选题与专论》中，作者先对南诏国史中18个存疑的，诸如“将奴逡自哀牢避难至蒙舍川”“乐尽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九征毁緡、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时傍母，归义女，妻阁逻凤”、“令清平官郑回撰《德化碑》，唐流寓御史杜光庭书”等记述中的问题一一作了考证和回答；又对大理国史中8个存疑的，诸如“思平即位，天福丁酉二年也”、段明“为君不振”而“段氏中绝”“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帝叔思良争位，废帝为僧”等中的问题一一作了考证与释疑；最后对大理段氏总管史上存疑的“元跨革囊”、段氏“世袭总管”的5次名实之变、“邑人陈玄子又立三洞玄说……以音教化”、至元八年“分大理三十七蛮部为南、北、中三路”“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等6个问题做了考证与解读。在书稿里，作者由大量的史料和缜密的逻辑考证了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及大理段氏总管时期的一些历史存疑问题，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作者缜密的思维和深厚的历史功底。

在《南诏野史新编与校按》书稿中，作者表明：“在仍然以《南诏野史》‘南诏国’‘大理国’‘段氏总管’三段历史为主体的基础上，因有‘南诏历代’部分的基础，及受‘历代’理念的触动，特意将云南地域上‘南诏国’之前和‘段氏总管’及其后的‘古国’，都作了力所能及的探究。”认为“《南诏野史新编与校按》之所谓‘新编’，一是在原《南诏野史》各版本体例及内容基础上的再编辑，二是将原来没有使用的史料补进去。至于‘校按’，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必须‘以史写史’，故往往要引用史料。然而，古代历史文献，即使是正史，虽为当时的大家、高手编撰，而且不为功利，非常认真。不过，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在撰写，尤其是传抄、印制中，都可能发生的错误，大体有7类：1. ‘衍’，多出的字句。2. ‘夺’，脱漏的字句。

3. ‘讹’，其它错误的字句。4. ‘误植’，文字、句子，乃至段落顺序的错误。5. 历史四要素中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的错误。6. 记述措词偏颇导致的错误。7. 众所周知，古代使用的是文言文，不仅用繁体字，而且不用标点符号。现代整理、印制的历史文献，都是标点的简化字版本。然而，不论断句标点不妥，还是不该用简化字而用了简化字的，都会使文意发生变化，甚至导致错误。有错而没有发现，知错而没能探求得正确结论，不能求得正确结论则应提醒但没有提醒，即使自己已经弄清楚正确答案而不予校订，那都仍将继续‘以错致错’。还有，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有的词、句，在撰写时就没有写明白；或在传抄、印制是有脱、讹；或由于今人缺乏古汉语、古人物、古事件、古地名、古官职、古习俗等知识，以及不懂其中有意无意夹杂的少数民族语或隐语，而读不明白。不明白，而不去弄明白，实在弄不明白则要提示而不予提示，弄明白了而不注释，那都仍将继续‘以不明白致不明白’。”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作者“故而‘校’，即‘校正’，是作者发现、解决引用资料中的‘错误’与‘不明白’的指出与订正，是不致仍然‘以错致错’，‘以不明白致不明白’所必须的基础性工作。按，就是‘按语’，对‘错误’及‘不明白’之处的“‘校正’，如有对其依据、内容等必要作进一步说明的，则再予“按说”。从作者的相关表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拳拳之心与勘正历史史料的使命感。

廖德广老师是我中学时代的恩师，也是我平生最钦佩的老师之一，亦师亦友，相交数十载，常承面命，期盼殷殷，使我晚辈不至懈怠。让我最为钦佩的就是身为官员的他，居然为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使命感，而选择提前退休，从此潜心从事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至今已然著作等身，硕果累累，让我等晚辈为之钦服，并为自己有这样的恩师倍感欣慰和自豪。

以此书序，聊表心意。

前言

凡是真正对历史产生兴趣的人，不论阅读还是研究，无不倾心致情的是第一手或尽可能接近第一手的史料。拙著“南诏史探系列”第一辑：《南诏德化碑探究》《南诏国史探究》；第二辑：《大理国王室探究》《彩云南文史探究》，就是对以“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为主的云南古代历史资料，在木芹先生《南诏野史汇证》的基础上，拟进一步辑全史料、辨析错误、阐释不明的，以期解决“史实不全”及文本错误，或没写明白或今人因文字演变、社会背景不晓、相关知识不够而读不明白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进行的第一遍探究与梳理。

然而，一是史料仍然有所缺漏；二是史料散存于唐宋元明各代正史及其他相关文献；三是包括正史的各史料文本，又都再发现了一些错误及不明白的记述。为了尽可能解决好如上的史料状况，让阅读者及研究者能有一个更好的史料平台，于是决定进行以“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为主的云南古代历史资料的第二遍探究与梳理，形成“南诏史探系列”第三辑，分《南诏史料辑要与校按》《南诏野史选辑最与校按》《南诏史题择要之专论》《南诏野史新编及校注》4册，为了准确考正并呈现原文，第三辑中引用的多为古文献繁体字文本。

该册为《南诏野史选最与校按》。

元朝的“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由于既是当时的十一省之一，又是元朝皇室子孙的封疆之国。元朝及历代镇守云南的“云南王”，后为级别高于“云南王”的“梁王”，对“大理”国后裔世袭“段总管”们的既用又防，防范过度，走到了日益不信任，甚至一再对“段总管”们予以打压，且拟用武力予以消灭的地步，终于在公元1333年形成了“梁段二国”的局面。50年后的公元1382年，明军灭掉当时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者梁王把扎刺瓦尔密后，“克大理”，大理都城被蓝玉部“将许江武纵火，烧三昼夜，蒙段历代经史多藏楼中。”（《大理古佚书钞·三迤随笔·蒙段四画师》）因此，五华楼中“南诏”国、“大理”国“藏书库”（国家图书馆）中的历史资料，便随楼一并灰飞烟灭。段氏王室书库（皇家图书馆），虽因一是石室而一时尚未起火；二是被沐英有见地的属僚李浩从下关赶到，率士卒及时抢救，“共两百多驮”，但因属私家收藏，多为文艺书籍与字画之类。故而，“蒙段史迹多中断”。（《大理古佚书钞·三迤随笔·蒙

段四画师》)此即弥渡县人师范所评：“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

时任“天威径镇抚使”的李浩，在“付之一炬”的战火乱局中，惟其独醒，组织抢救了“两百多驮”文献，后整理抄录出4部史料。但不无遗憾的是其中上解大明朝廷、云南省府及镇守云南的沐英三部史料，在后来的历史风云中不知所终；而李浩自留家传的一部，也不断散失，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投进了纸浆池。好在李浩及后人曾抄录而形成的一些笔记体文献，尽管也历经坎坷，总算幸存下来。公元1999年底，明朝“天威径镇抚使”李浩第十九代孙李莼，将其先辈们的部分残存书稿的第二次抄录本，交送大理州文联主席尹明举。公元2001年，在州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由大理州文联审读、校勘、编辑，以《大理古佚书钞》书名付梓。《大理古佚书钞》包括李浩著《三迤随笔》玉笛山人(李以恒)著《淮城夜语》、张继白著《叶榆稗史》3部文献。

就像李浩及其后人一样，世上总有清醒者及有心人。元明一些对社会历史有良知与肯担当的学者，搜集“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等云南古代的零散史料，并采访口传、考察遗迹及依据正史等，予以辑撰，终成：

元朝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因作者生年关系，十一世总管中只写了第一世。

明朝嘉靖初，杨鼐的《南诏通记》。

嘉靖初，杨士云的《郡大记》。

嘉靖十一年(1532年)，蒋斌的《南诏源流纪要》。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杨慎的《滇载记》，嘉靖二十九年庚辰八月杨慎的《南诏野史》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昆明人倪辂辑撰的传记体《南诏蒙段野史》，是“上以广国家方輿一统之盛，下以备古今滇云始末之详”，乃“南诏”国“大理”国“段总管”历史，首次以“南诏”及“野史”词汇命名的，并还追溯有“南诏历代”，也辑录当时明朝史料的云南古代史颇有影响的著作，“诚郡乘之稗史也”。此后，明崇祯六年(1633年)，“马龙阮元声依倪、杨本而删润之”为阮本《南诏野史》。

直至清朝，形成的10多种《南诏野史》版本书系，就是在倪本、阮本基础上予以传抄、考正或增订。

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有“嗜古而好游，两涉滇南，往来三迤”的湖南武陵人胡蔚在杨慎《南诏野史》基础上，订正的《增订南诏野史》。

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总通省志局事”的浪穹（今洱源）县人王崧，“编纂之暇搜集前人纪载滇事之书，汇为一编，名曰《云南备征志》。”（查林《云南备征志·牟言》），因“得阮本之传钞者数本而参互考定，勒为一编，刊入《云南备征志》”（袁嘉谷《南诏野史书后》）的王崧考定本阮元声《南诏野史》，袁嘉谷称之为“最可征信”的版本。

这以后，由于阅读、研究、存史等需要，抄录、印刷的《南诏野史》版本还较多。比如，云南大学木芹先生撰写《南诏野史会证》时，“所得本子有南京图书馆藏钞本、淡生堂藏钞本、环碧山房藏钞本、王崧云南备征志本、方臞仙藏钞本甲和藏钞本乙、胡蔚增订之刻本及丁毓仁《南诏备考》、还有胡蔚《南诏野史》道光刻本、清佚名校钞本、施云德钞本，又缺首尾之钞本，共12种。知道有而尚未获读者有大理文化馆藏钞本。”2012年刊行的《大理丛书·史籍篇》则辑有：倪辂撰杨慎校《南诏野史》淡生堂传钞本（一卷本）、倪辂撰杨慎校《南诏野史》清佚名校补传钞本（一卷本）、倪辂撰杨慎校《南诏野史》传钞旧本《南诏野史》（一卷本）、杨慎编辑胡蔚订正《南诏野史》罗振常藏本（二卷本）、杨慎编辑胡蔚订正《南诏野史》袁嘉谷跋本（三卷本）、倪辂撰《南诏蒙段野史》清光绪元年施云德钞本（一卷本），及王崧“参互考订”而编纂的阮元声著《南诏野史》（上下卷），也有7种。

虽说《南诏野史》的本子较多，然而同出一源，即明代倪辂《南诏蒙段野史》始本，后形成两种拓展本：一是明阮元声的“考证”本《南诏野史》，二是明杨慎的《南诏备考》。清朝经济特科状元云南石屏县人袁嘉谷先生，探究了《南诏野史》诸本的编撰实际，认为对“南诏”历史进行实质性研究，并有拓展的“南诏野史凡五本，一曰倪本，昆明倪辂撰，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载之，凡一卷。二曰杨本，嘉靖二十九年新都杨慎据倪本而荟萃成编，即乾隆四十年胡蔚据以增订者。三曰阮本，马龙阮元声据倪杨本而删润之……四曰胡本，武陵胡蔚据杨本而订正之，分上下卷，即今单行之本。五曰王本，浪穹王崧得阮本之传钞者数本而参互考定，勒为一编，刊入云南备征志者”。（《南诏野史书后》）方国瑜先生则说：“《南诏野史》诸本之内容，今通行者胡蔚、王崧两刻本，尚存数种传抄本，以两刻本所收最详。”所谓胡蔚本即杨慎增订本的再增订，而王崧本即阮元声考证本的再考证。对这两个“所收最详”而“通行”的刻本，

袁嘉谷曾在其《南诏野史书后》一文中这样评说：“今所传惟胡本、王本，而王本最足征信……光绪庚辰（1880年）滇刻野史，竟不取王本而取胡本，王本之流传遂不如胡本之广。”所以，《南诏野史选最与校按》的“选最”，就由有关史籍中选出6本，并因历史地位及作用，称为：

1. 最早系统追溯“滇事”的宋朝张道宗《纪古滇说集》。

2. 被认为是《南诏野史》书系最原始而重要的白语版本《焚古通记》的演绎之书存本，即元朝赵顺撰《焚古通纪浅述》。

3. 被参考辑按最多的明朝杨慎《滇载记》。

以上是《南诏野史》书系之前“记古滇事”史籍的三最。

4. 最先使用“南诏”“野史”称谓，开《南诏野史》书系先河的明朝倪辂《南诏蒙段野史》。

5. 最足征信的，辑入清·王崧《云南备征志》，明·阮元声著、清·王崧编纂《南诏野史》。

6. 流传最广的〔清〕·胡蔚《增订南诏野史》。

这是《南诏野史》书系中的三最。

笔者除选辑外，还作了“校”“按”的撰述工作。因为这“六最”文本中，都存在一些“错误”及“记述不明白”和起码是我曾不明白的地方。为了不再“以错致错”，以及“让不明白始终不明白”，从而让这“六最”历史文献发挥好应有的作用，不揣冒昧，对“错误”进行力所能及的“校订”，而对“不明白”的，则进行必要的“按说”。

为尽可能得睹这6份历史文献的原有风貌，均按原繁体文字辑录，只是变直书为横书。

读历史资料，引历史资料，当以无标点的繁体字文本原貌为好。故对“选最”文献，本不想断句标点，只因考虑到古文断句的困难及不同断句，可能引发的歧意，为读者、使用者方便，给出自己阅解的标点，也仅供参考而已。

廖德广

2016年8月5日

目录

序 / 1

前 言 / 1

一 记古滇事史籍之最

1. 纪古滇说集 [宋]张道宗 撰次
[明]杨慎 点校 阮元声 考正 / 2
2. 白古通纪浅述 [元]赵顺 撰 / 28
3. 滇载记 [明]杨慎 撰 / 71

二 南诏野史书系之最

1. 南诏蒙段野史 [明]倪辂 撰 / 90
2. 南诏野史 [明]阮元声 著 [清]王崧 编纂 / 131
3. 增订南诏野史 [明]四川新都杨慎升庵 编辑
大清湖南武陵胡蔚美门 订正 / 178

参考资料 / 276

后 语 / 280

一 记古滇事史籍之最

对“古滇”（古云南）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始于宋代，主要有〔宋〕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元〕赵顺撰《白古通记浅述》，〔明〕杨慎撰《滇载记》，可谓是记古滇事古籍之最。

1. 纪古滇说集

〔宋〕张道宗 撰次

〔明〕杨慎 点校 阮元声 考证

关于云南明朝以前古代历史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大量地出现于明朝，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杨鼎撰《南诏通纪》，已佚。但据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记载，〔万历〕《云南通志》《明史·艺文志·地理》有书名录存。“鼎号敬庵，太和（今大理市）人，宏（弘）治己酉（公元1489年）举人，官至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州市）通判。”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认为：“《南诏通纪》，以《白古通记》为主要的编撰依据。”

顾应祥撰《南诏事略》，无作者及写作时间的直接资料。〔万历〕《云南通志·官师》有记载：“顾应祥，字维贤，长乐人。嘉靖间再任巡抚，首尾凡六年。高明宽大，不事苛察。文章行谊，为时所推。”

落款“大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3年）“赐进士出身兵备副使湘源蒋斌书”的《南诏源流纪要》。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认为：《南诏源流纪要》“以《南诏通记》《白古通记》为主要编撰依据”，但“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了改纂”，而“经他这一番增删与改纂之后，不仅于史无益，而且徒增麻烦。”

有序于明“嘉靖癸卯”（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的四川新都状元杨慎撰《滇载记》。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认为：“《滇载记》的内容出自《白古通记》，而不是录自汉文史籍”，是“一本对云南地方史志编撰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有些“认为《滇载记》的作书经过也是杨慎捏造以欺世人”，而“过于相信前人常谈到的杨慎喜欢作伪的看法……但是，事实与前贤的看法相去甚远”；因此，“《滇载记》作为‘白古通’系云南地方史志之一，应该得到正确的认识”。

完成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云南昆明人倪辂著《南诏蒙段野史》。

成书于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云南马龙人诸葛元声编《南诏蒙段野史》及《滇史十四卷》。

但是，对云南明朝以前古代历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不是始于明朝，因此也不是始于倪辂著的《南诏蒙段野史》。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人开始做。印存的最早成果，为首刊于明朝付梓的《玄鉴堂丛书》中的《纪古滇说集》，乃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正月初八日，滇民张道宗录”。

《纪古滇说集》是蒙古国公元1253年灭大理国后，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前五年，署名为“滇民张道宗”所撰，是研究以“滇”，即今云南省为主体的西南历史而形成的一份最早的系统性史料。尽管史料不丰，也就是沐朝弼序所评的“病其略”。但已具有倪辂始撰，后世或予校理，或加增订，并予抄录或刊印而形成的《南诏野史》

书系的大体构架，其内容涉及南诏历代、大蒙国（南国、南诏国）、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国、段氏总管，实属滇（云南）省“南诏”（南王）历史的最早研究成果，因早于明朝研究者们300多年的时空所致，是最接近“南诏”（南王）历史事实及当时观念的文本。因而笔者将其算作是《南诏野史》的先声，特辑入“南诏野史选最”之列，并位居首位。姑称为：“研究古滇（云南）历史的最早文本”。

《纪古滇说集》一书，笔者最早见到并录用的是主编主点李春龙、副主编主点刘景毛《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中的“点校”文本。当奚寿鼎先生2011年中告知笔者《大理丛书·史籍篇》即将付梓后，便一直等待，以企在《南诏史料辑要与校按》及《南诏野史选最与校按》中不发生有关史料应选而漏选的遗憾。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虽署公元2012年10月出版，但实际是2013年11月才印行的《大理丛书·史籍篇》后，经对照，还是依《大理丛书·史籍篇·卷二》辑出。虽然《大理丛书·史籍篇·卷十》中还辑有《纪古滇说》，也署“元张道宗撰”，但比较下来，《大理丛书·史籍篇·卷二》的行文，显然是三个本子中较少经过抄写致误、编辑变貌等后人影响，从而是最为接近原文的版本。沐朝弼的“纪古滇说集序”“博南戍使杨慎升庵”的《跋纪古滇说集》以及《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存目提要》，由于《大理丛书·史籍篇·卷二》中没有刊录，特从《大理丛书·史籍篇·卷十》中的《云南备征志》所辑本补出。

雲南為古滇國（德广按：不符史实，之前就有白氏、昆明等古国），天則參、井餘氣；地則梁、益裔土，故其沿革附於巴、蜀，《河圖緯》所謂南中為蜀之範圍是也。《史記·鹵南夷列傳》，班固、範熠衍之；至晉常璩作《南中志》，附于《華陽國志》，詳矣。余家重膺天恩，世守滇雲，戎政之暇，求滇之遺跡，病其略也。蓋史之體，內華夏而外荒徼。今也九州同域，四瀕弋貫，固不戢其詳且煩也。于類書所引楊子雲《蜀本紀》、譙周《異物志》，僅存千百於弋二；若任豫（李膺）之《益州記》、韋瑄（韦皋）之《云南（西南夷）事狀》、韋齊沐（德广按：有的文献为休）之《雲南行記》，樊綽之《雲南志》（《蛮书》）、《南蠻記》，皆名存而籍亾久矣，莫可徵也。家所舊藏有《紀古滇集說》，迺宋人張道宗所錄，始自唐虞，迄於咸淳，方輿、年運，謠俗、服叛，弋弋詳焉。雖亾（其）文不雅馴，而鑿鑿傳信，不可刪以迷亾真也。其紀金馬事，大與《漢書》所謂“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之說迥異，文儒信史者多疑之。余謂是書本偏方所錄，自言風土，當得亾寔。漢使王褒祭金馬、碧雞之神，望亾塋不至，又安能必亾說為信，而此所錄可疑虜？並存之可也。遂命

梓人鑿之，上以廣國家方輿一統之盛，下以補職守忠愛萬一之禔。觀者幸鑒，鄙意焉。

嘉靖己酉十又二月朔日。

欽差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沐朝弼謹序。

云南为古滇国，此说不确，这或许因缺乏史料，或因未全面研究而误，是不认可“滇”国以前及与“滇”国同时的那些“君长”之国而言的，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今云南地区，与“滇”国同提的就有“昆明”“夜郎”以及“同师”“牁榆”（叶榆）“嵩唐”等国。更早的，则在《史记·秦本纪》中还有“义渠”“丹黎”等国；而《华阳国志》中还有“句町”国（《古汉语大词典》有注，“句町”的“句”，音gu，第四声，如“固”，而非有时所注所闻的“勾”等）。而《逸周书》《山海经》中还有五帝时代就有的“白民”国。

现在，虽然重视研究、宣传、开发云南历史文化。但是，只注重“滇”国及其后的，对大体同时的“昆明”“夜郎”，以及“同师”“牁榆”“嵩唐”“句町”等国，特别是唐朝还见诸于正史的“昆明”“叶榆”（牁榆）两国以及为国比他们更早、《史记》有记载的“义渠”“丹黎”，甚至更早的“白民”等都基本不涉及等，这无疑是不全面和不妥当的，理解为云南，古滇之地较妥。

纪古滇說集

〔宋〕张道宗撰次

〔明〕杨慎点校 阮元声考证

古滇（德广按：古滇之地，即云南地区），始自唐（德广按：尧帝）、虞（德广按：舜帝）。而葺（前）渐渐有埜（野）人，授土號，法外君長。唐分命仲宅西，曰昧谷。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大禹治水，命神庚辰徇南海，分派江河，流砂金色，故名金沙。入昧谷，見水多聚於山頂，溪池廣遠，谷島高峙，乃曰滇水。滇水周三百餘里，其地萬里皆蠻夷有。西窮極有大秦國、身毒國（今印度，“身”音yuan，員）、義渠國、繳濮國，茶弼沙國。有聖人名徂葛尼到此諸國，皆有君長。茶弼沙是日落之所，有大洋，日入其洋矣。外有緬夷諸國，西南滨海。黑水（德广按：澜沧江）所流八百、日南、占城、真臘、登流、眉賓、童童國，有王，舍城中，

目連舍基，此南海濱也，與滇水相去不遠。

自此，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揲榆（德广按：又叶榆），名為雋（德广校补：唐）、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德广校补：越）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德广校补：都）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時周室中興。先是昭王二十一年，有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德广校补：达）多，不欲為君長，入山禿發。至是闻西天竺即身毒國有國王曰摩耶提，是淨飯王摩耶之後裔。摩耶提名阿育，生三子：長曰福邦，次曰宏德，季曰至德，三子俱健勇。阿育王有神驥一匹，高八尺，紅鬃赤尾，毛有金色，三子共爭之。王莫能決，曰：“三子皆一也，與一則偏一，而不愛於二也。”命左右曰：“將我神驥縱馳去，有能追獲者主之。”乃一縱直奔東向去，三子各領部眾相與追逐。其季子至德先至滇池之東山獲之，即名其山為金馬山；長子福邦續至滇池之西山，聞季子已獲其馬，停憩於西山之麓，忽有碧鳳呈祥，後誤目山曰碧雞；次子宏德，後至滇之北野，各主之。王憂思滇類眾，恐未獲歸，乃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應援。哀牢夷阻兵塞道，不復返。

哀牢國，今永昌郡。其先有郡人蒙迦獨，妻摩梨羌，名沙壺，居於哀牢山。蒙迦獨常捕魚為生，後死哀牢山水中，不獲其屍。妻沙壺往哭於此，忽見一木浮觸而來旁邊漂沉，離水面少許，婦坐其上，平穩不動。明日視之，見木觸沉如舊，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姪十月，孕生九子，復產一子，共男十人。一日，同母行至池邊，問父所在，母指曰：“死此池中矣。”語未，已見沉木化為龍，出水上，語曰：“若為我生子，今俱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一小子不能去，母固留之。此子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喚其名曰習農樂（德广按：即細奴邏，后同）。母見子背龍而坐，夷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其池曰九隆。習農樂後長成，有神異，每有天樂奏於其家，鳳凰棲於樹，有五色花開，四時神人常衛護相隨。諸兄見有此異，又能為父所舐而與名，遂共推以為王，主哀牢山下（德广按：“下”衍）哀牢山又有一人喚奴波息夫婦，復生十女子，習農樂兄弟皆娶以為妻。奴波息見習農樂有神異，遂重愛之，而家大旺。鄰有禾些和者嫉，欲害之，習農樂奉母夜奔巍山之野，躬親稼穡，修德惟勤，教民耕種。其九兄弟有妻後，漸漸相滋長。

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習農樂於巍山之野，主其民，咸相尊讓。有梵僧續舊緣，自天竺國來，乞食習農樂同室人細密覺（德广按：即得弥脚），勤供於家。細密覺餉夫耕，則見僧先坐耕所。語曰：“汝夫婦勤耕稼穡，以王茲土者無窮也。”語畢，騰空去。乃知是觀音大士。復化為老人，自鑄其像，留示於後，今阿蹉（德广校补：耶）觀音像是也。後大將軍張樂敬求來會諸首，合祭鐵柱，鳳凰飛上習農樂左肩，樂敬求等驚異，遂遜位其孫名奇嘉者（德广校：遂妻女遜位与其，称奇王），以蒙號國。

前哀牢王兵阻道，阿育王三子不复返矣，遂歸滇，各主其山。後楚莊王（德广校：楚顷襄王，公元前299年～公元前264年在位）遣將莊躡總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見池（德广按：时指洱海）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滇民服焉。欲歸報，會秦並六國，擊楚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還，以其眾王滇。其阿育王三子並神明四甥舅遣眾，與躡兵同諸夷雜處。躡為滇王，崇信佛教，不忍殺生，遷居白崖、鶴拓、浪穹。後，眾推張仁果者君之，滇王躡傳世遂卒。仁果肇基白崖，尚創業之祥於茲，遂以其地號國曰白。守三綱，明六藝；本戒法於天竺，枝姓文于漢唐；號年法古，正朔從夏。（德广按：有版本为“操存五常之固有，不昧一真之虛靈；堅守三綱，修明六藝；本戒法於天竺，枝姓文于漢唐；言從善簡于諸語，服隨世俗于時宜；號年法古，正朔從夏。采摭諸家之善，自集成於一枝，而為白氏國也。”）

秦滅漢興，漢武帝元狩元年夏五月，使博望侯張騫請通西域，自大夏使還。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使（德广校：便）近，又無害。騫還，告帝前言，又曰：“身毒國，乃天竺國也，去蜀不遠。”帝再遣騫道通滇，為益州，亦曰昆明。冊張仁果為滇王（德广校：主），通商賈，貿易用具。

於是，漢天子再遣王然于、柏姑（德广校：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通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德广校：主）張仁果尚在白崖，彼騫雖奉冊命之，而張仁果仍白氏國也。王然于等所會滇王常羌，亦莊躡之遺也，乃留。然于等求道四年餘（德广校：十餘輩，岁余）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我孰為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德广校：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後王然于以破粵及諸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至元狩三年，作昆明池以習水戰。元鼎六年，漢平西南夷，置五郡。元封二年秋，漢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德广校：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王玉（德广按考古发掘成果校：金）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德广按：《史